

继《白鹿原》《平凡的世界》市场大获成功后,《尘埃落定》《主角》《生命册》等多部当代文学经典进入搬演时分

“茅盾奖”集结上海话剧舞台,文学性归来

■本报记者 童薇菁

近期上海舞台刮起一阵生猛的“西北风”,刮来自大山高坡粗犷质朴的生命劲道。在潮水般的掌声中,陕西人民艺术剧院(以下简称“陕西人艺”)话剧《白鹿原》日前落下了第360场的帷幕。继《白鹿原》《平凡的世界》大获成功后,《主角》和《生命册》两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也将搬上陕西人艺的舞台。

与此同时,以四川人民艺术剧院为演员班底、根据《尘埃落定》小说改编的同名话剧已经创作完成,今年四月将亮相上海舞台,国内多个城市已开票,未演先热。

以“茅盾文学奖”为代表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已经成为不少国内制作人的手边书。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罗岗教授认为,在现实主义舞台的创作热潮下,文学力量的回归,在很大程度上凸显“剧作家就是文学家”的含金量,让戏剧重回文学传统再度成为创作主流。



▲话剧《白鹿原》剧照。
▶话剧《平凡的世界》剧照。
(均陕西人艺供图) 制图:李洁



“文学流量”为舞台注入绵绵不绝的生命力

“话剧舞台对文学性呼唤已久。”话剧《尘埃落定》编剧曹路生说。近年来,国内戏剧界反复掀起对“后戏剧剧场”的讨论,其背后隐含着对中国戏剧该怎么走的真实焦虑与思考。“过去十几年,国外种种戏剧流派涌入中国,但现在所谓的后现代戏剧也好,后戏剧剧场也好,文学性是大大削减的。”

作为陕西人艺现任“掌舵人”,李宣深知创作应“以剧为本,以剧带人”。面对转企改制的契机,陕西人艺在一年里做了12部小剧场话剧,更是倾尽一团之力打造话剧《白鹿原》。要知道,在2009年前的近五年时间里,陕西人艺连一部小剧场话剧也没有排演过。

厚积薄发、摸着石头过河的《白鹿原》终于成了爆款。“我一直想要流量,终于,流量来了!”李宣对记者说。话剧《白鹿原》的艺术生命来自文学经典,来自观众对经典的“信仰”,这是深邃的文学赋予的市场潜力。“每一个人都有对精神更高层次的向往,可能平时连自己都没有发觉,一旦碰见了那个对的按钮,突然就连接上了。”

两年后,陕西人艺又将小说《平凡的世界》搬上舞台,质朴大地上的命运传奇,和当代观众的心灵一次又一次共振。至此,中国文坛上赫赫有名的“文学陕军”代表人物——关中大陈忠实“陕北路遥”在他们的小说之外,又获得了一座与大众对话的舞台时空,在这里,能听见他们对古老土地的动人倾诉。

“以生活为标准,又不抵触现代风格”的创作准绳,让陕西人艺的经典文学改编往往不拘一格,扎实耐看。“譬如《白鹿原》的舞台处理就带点传奇色彩,而《平凡的世界》就是细水流长的生活化。”陕西人艺副院长李俊强是一名85后,同时他也在《平凡的世界》中饰演孙少安,青年演员如今已成为剧团的中坚力量。李俊强说,演绎经典文学中的经典人物,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演员的表演风格,由文学经典锻造的舞台经历对年轻演员成长的影响弥足珍贵,“让我们褪去浮夸,走向扎实与沉稳,在每一个细节中去成就人物,成就生动的中国故事”。

“文学流量”为舞台注入绵绵不绝的生命力。参与《白鹿原》《平凡的世界》《尘埃落定》等多部话剧剧作和市场推广的“九维文化”创始人张力刚告诉记者,如果没有《白鹿原》和《平凡的世界》,2020年的一场疫情,可能就会让公司濒临破产。“过去,我们公司运营的绝大多数项目都来自海外,现在,越来越多的本土原创开始爆发生命力,更让我们坚定——要以经典博市场。”

“《白鹿原》的诞生,彻底地改变了我们剧团,带来了新的生命和新的希望。”谈起剧团一度面临“无演员、无主创、无观众”的困境,李宣仍有些哽咽,“2015年《白鹿原》创作完成,我们并没有太大的信心,但还是决定来闯上海的码头。没想到到上海市场那么热情,我特别感谢上海观众,因为一部作品的生命,是离不开良师益友的陪伴的。”从上海开始,这部“百人团”大制作在它诞生的五年间,纵横国土十余万公里,不断书写“一票难求”的市场佳话。

如今,演了五年的《白鹿原》要暂时封箱了,因为今年10月,陕西人艺要迎来新剧《主角》的首演。在陕西人艺拿下小说《主角》改编权时,陕南作家陈彦和他的这部小说还没有获得“茅盾文学奖”,他另一部作品《装台》也还没有在电视上播出、引发如此大的轰动。《主角》尽态极妍地叙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近半个世纪人生的兴衰际遇和起伏沉浮。陈彦曾在戏曲院团工作30年,对秦腔艺术有很深的研究。在小说中,他展现了多个具有时代感的命题:关于非遗传承、关于艺术人生、关于个体与大历史的复杂关联。

“今天,一个名角儿、一个戏骨如何面对行业的变革,如何看待个人被时代所赋予的价值,尤其当他的艺术生命到达顶峰时,是否转换主角与

经典改编是在高原上再建一座高峰

“《白鹿原》的诞生,彻底地改变了我们剧团,带来了新的生命和新的希望。”谈起剧团一度面临“无演员、无主创、无观众”的困境,李宣仍有些哽咽,“2015年《白鹿原》创作完成,我们并没有太大的信心,但还是决定来闯上海的码头。没想到到上海市场那么热情,我特别感谢上海观众,因为一部作品的生命,是离不开良师益友的陪伴的。”从上海开始,这部“百人团”大制作在它诞生的五年间,纵横国土十余万公里,不断书写“一票难求”的市场佳话。

如今,演了五年的《白鹿原》要暂时封箱了,因为今年10月,陕西人艺要迎来新剧《主角》的首演。在陕西人艺拿下小说《主角》改编权时,陕南作家陈彦和他的这部小说还没有获得“茅盾文学奖”,他另一部作品《装台》也还没有在电视上播出、引发如此大的轰动。《主角》尽态极妍地叙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近半个世纪人生的兴衰际遇和起伏沉浮。陈彦曾在戏曲院团工作30年,对秦腔艺术有很深的研究。在小说中,他展现了多个具有时代感的命题:关于非遗传承、关于艺术人生、关于个体与大历史的复杂关联。

“今天,一个名角儿、一个戏骨如何面对行业的变革,如何看待个人被时代所赋予的价值,尤其当他的艺术生命到达顶峰时,是否转换主角与

经典改编是在高原上再建一座高峰

舞台美轮美奂之后,不如我们重读《浮生六记》?

■本报记者 柳青

昆剧《浮生六记》开场的时候,芸娘已经死了,沈复在回煞夜苦等亡妻魂归。这戏演到最后,芸娘本人始终没有出现,即便是生旦缠绵的戏份,出现的也只是沈复执念唤出来的女鬼。才子佳人虽人鬼殊途,却上演春色旖旎的富贵行乐图。昆剧《浮生六记》词写得美,戏做得美,舞台上一切细节美轮美奂,隔着这样风花雪月流光溢彩美轮美奂的滤镜,观众可还记得沈复《浮生六记》的风貌?

“最可爱的女人”,并不是丈夫凝视的魅影

俞平伯曾为《浮生六记》1923年重印版写了序,他提到:“作者沈复是个习幕经商的人,不是什么斯文举子。偶然写几句诗文,也无所存心。”这篇序结尾微妙得很:“我岂不知这是小玩意儿,不值当作溢美的说法;然而我自信这说法不至于是溢美。”那么,这本被形容成“无酸语、赘语、道学语”的日记,到底值不值呢?林语堂在1939年的汉英对照本《浮生六记》序言里直率地写出:芸娘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显然,《浮生六记》这本“作者偶然写就,无所存心”的“小玩意儿”,若不是因为芸娘,很可能早已在时光的尘埃中风流云散。

沈复落魄时,妻子陈芸确乎是过世了,在《困居日记》一卷,他几次悲叹妻子早逝,如,“乐极生灾,白头不终之兆”“布衣菜饭,不必作远游记,今即得有境地,预知已沦亡,可胜浩叹”。把《浮生六记》中与芸娘有关的记录拿出来,当然可以看作一部深情的悼文——

他们之间有儿女情长的闺房意趣,但即便在困居私话中,芸娘仍是一个有独立审美趣味和判断意志的人。她和丈夫交流时,能有理有据地声张自己的文学主张:“杜(甫)诗锤炼精纯,李(白)诗激洒落拓。李诗宛如姑射仙子,有落花流水之趣,令人可爱。”

她虽然在大家庭的日常中“迂拘多礼”,但是对家庭生活之外的世界充满好奇,当丈夫因家族事务外出时,她愿与同行,因为念着途经太湖,“一宽眼界”。看到“帆船沙鸟,水天一色”的开阔景致,她感叹:“今得见天地之宽,不虚此生。想闺中人有终身能见此者!”

她用主动的姿态为自己打开社交的小天地,能与一面之缘的渔家女把酒言欢,



昆曲《浮生六记》2.0版登台上海大剧院,图为彩排照。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会不蒂蒂地和风月场中的憨童一见如故,用林语堂的话说,“爱美成痴”。也是因为她这原生的、无意识的独立意志,她不见容于大家族森严的父权系统,被厌弃,被驱逐,半生流落,在困顿中病亡。

芸娘诚然是沈复的解语花和贤内助,但她更有自己阔达的精神世界。她的形象在沈复的笔下“再现”,但他与她之间,不是创造者和造物物的关系,不是皮格马利翁和他的大理石少女。他记取了生命中吉光片羽的片段,而那些微小的火花找回他曾经灿烂的生命,她闪光的形象最终从他的视角中挣脱,作为独立的主体傲然于时间之外。

《浮生六记》能让林语堂愿意用英文译文去推介“中国文学中最可爱的女人”,打动他的,到底是沈复深情塑造芸娘的“行为”,还是从文本中升腾而起的、一个会呼吸、有血肉的芸娘呢?答案应该是后者吧。《浮生六记》被看作一份爱的记录,其中真正有生命力的是能给出爱的行为的芸娘,她是有温度、有气性的个体,辗转挣扎来这世上活过一遭——她不是丈夫目

光下的镜花水月的鬼魅幻影。

市井烟火中的诗与远方

深情若以病和死作句读,是脚不沾地的偶像剧写法。沈复虽然在《浮生六记》的开篇写芸娘的形容娇怯,少女时“削肩长颈,瘦不露骨,一种缠绵之态”,新婚夜“瘦身材依然如昔”;但纵览《浮生六记》全文,芸娘绝非是在身体感官层面充满诱惑且满足男性愉悦的“娇娇楚楚妻”。沈复一生寂寂无名,他是个性情温柔的好人,但也可说志大才疏,潦倒以终。他与芸娘的生活,与其说是才子佳人不知人间疾苦的富贵行乐,不如说是日复一日的苟且中经营出些微的诗与远方。

《闲情记趣》里记录了一次郊游野餐,一群人既想赏花赏春,又想户外吃上热食,于是芸娘张罗着去集市上“包”下一个馄饨挑子,用小贩的炉灶整出满席的热酒热菜热茶。风和日丽,青衫红袖,众人兴尽,纷纷赞“非夫人之力不及此”。其实

当时芸娘与沈复寄人篱下,日常生活极为拮据,家用靠芸娘做绣工和沈复零星卖画所得,沈复呼朋唤友,需得芸娘“拔钗沽酒”。

在《坎坷记愁》中,沈复苦涩地写着人情和金钱的困扰:“余夫妇居家,偶有需用,不免典致。处家人情,非钱不行。先起小人议,后至同室之讥。”“三日所进,不敷一日所出,焦劳困苦,竭蹶时形。”芸娘死前数年,这对夫妻没有几天不是过着贫病交加的日子。

年少时,“不知世间有如我两人情兴否”,岁月中,“年愈久而情愈密”;如此种种,底色却是真实惨淡到无以复加的人生。惟其如此,沈复的这本小书方显珍贵,因为他在无边无际的人生困境里,留下了星星点点的温暖烟火。恰恰是这一点,在时光流转以后,让俞平伯感叹:“幼年读此书只觉可爱,(多年后)始茫茫然若有所领会。”

若抽离了市井凡俗的烟火气,让芸娘成为“美则美矣,毫无生活”的一缕魂,那么《浮生六记》大概真的就是“不值当作溢美的小玩意儿”。

■本报记者 许畅

“出版界失去了一位贡献卓著的长者,文化界失去了一位睿智的守望者,广大读者失去了一位富有童心的朋友”——著名出版家沈昌文10日去世后,文化界、知识界人士纷纷表达悼念。曾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长期执掌文化杂志《读书》的沈公,对当下出版有何启示?

“沈公的组织才能、包容态度和不下问,以及各种各样服务作者的办法,使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三联获得了不竭的文化资源,影响了一代读者。”日前,在上海朵云书院·戏剧店举办的“书香的旧梦——追忆沈昌文先生”小型追思会现场,资深出版人陈昕谈到,沈公最令他钦佩的一点,便是“广交学界朋友,擅借用外脑;在错综复杂的环境里,冲破重重阻力,和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想方设法出版好书、办好杂志,为社会进步奉献本心和智慧”。

比如,在他主持三联期间,引进出版了《宽容》《情爱论》《第三次浪潮》等风靡一时的西方经典译著,团结了夏衍、吕叔湘、钱锺书等众多文化名人。他主编的《读书》既不乏对学术文化界的前沿思考,又坚持大众化的轻松活泼风格,聚集了一批忠实读者。

用学者陈子善的话来说,“沈公眼光远大,宽容,关爱年轻人,能团结吸引有不同想法的人”。这份海纳百川,直观体现了沈公无先入为主、无偏见的办刊态度与人生境界。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葛兆光表示,沈昌文当初开创了“中国编辑界非常有趣的现象——一个没有自己专业、没有特定立场、没有特别固执角度的人,也许在那个时代当杂志主编恰恰能够促成一份好杂志,“沈先生最大的作用就是他没有墙,没有自己的偏见”。

“值得称道的是,这份宽容并不意味着没有个人风格,恰恰相反,《读书》有着强烈的美学追求。”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江晓原还记得,自己念大二时,《读书》创刊,他就成了忠实粉丝,至今收集了全套的《读书》以及沈公后创办的《万象》杂志。而《读书》的办刊理念中,沈公非常强调对文本的美学追求,这使得《读书》能被众多学人如此心仪,比如沈公曾说过,“我们退掉过很多著名学者的稿子,他们的观点很可以,但是文笔实在不行”。这在当时的学界刊物中也相当具有突破性开拓性。

作家孙甘露用“塑造了一个时代的风尚”来形容沈公主持刊物的影响力。出版了沈公多部作品的草婴文化董事长王强说:“他的谦逊、包容、润物细无声的气质,激励我们继续做事、继续畅想,让生命意义也变得更崇高。”

评论家汪涌豪表示,沈公是豁达的人,同时也幽默、皮实,还有点“狡黠”,“他生前非常精彩,身后也有足够的哀荣,这是很了不起的”。恰如上海巴金故居副馆长周立民所说,当下研究出版传统的时候,沈昌文的经验仍值得重视并深入研究。

沪上文化界追忆著名出版家沈昌文

沈公的『包容』与『挑剔』予当下出版何种启示